

第一人称有限视角和不可靠叙述

——辛格《旅游巴士》叙事策略与主题的融合

于 杰

摘 要: 辛格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美国犹太作家之一,他擅长使用独特的叙事策略来彰显作品的主题意义。他的小说《旅游巴士》的叙事策略,就独创性地采用了第一人称有限视角和由此带来的不可靠叙述,让读者和“我”一起感同身受,聆听各个人物的倾诉,共同思索事情背后的真相,最大程度地调动了读者的文本参与意识,从而凸现了小说所蕴含的主题意义:现代世界充满了未知的神秘因素,犹太人始终摆脱不了逃离的命运。

关键词: 《旅游巴士》;有限视角;不可靠叙述;主题

中图分类号: I10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90X(2013)10-173-03

作 者: 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生,上海,200083;潍坊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山东,潍坊,261061

197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艾萨克·巴什维茨·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 1904-1991)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美国犹太作家,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拉斯·吉亚斯坦教授称辛格为“当代最会讲故事的小说大师”,“他充满激情的叙事艺术不仅扎根于波兰犹太人的文化传统之中,而且反映和描绘了人类的普遍处境。”辛格一生的创作可用卷帙浩繁来形容。他的全部作品先用意第绪语写成,再由他人或与他人合作翻译成英文出版。辛格翻译成英文出版的长篇小说共有11部,回忆录5部,短篇小说集12部。其中以短篇小说艺术成就最高也最为人称道,例如让他一举成名的《傻瓜吉姆佩尔》(Gimpel the Fool, 1953),索尔·贝娄(Saul Bellow)翻译成英文并于同年刊登在《党派评论》上。短篇小说《旅游巴士》(The Bus, 1982)是辛格的后期作品,作品从多方面展示了辛格的独特叙事技巧,以及对犹太教传统、犹太人现代生存状况的理解与思考。《旅游巴士》讲述了故事叙述者“我”,一位美籍犹太作家乘坐旅游巴士的欧洲之旅经历。司机要求大家相互交换座位,以便人人都有机会获得最佳的观光视野并可以和不同的游客进行交流。通过谈话交流,“我”认识了韦厄豪弗夫妇(Mr. and Mrs. Weyerhofer)和麦塔隆夫人(Mrs. Metalon)及她的儿子马克(Mark)这对母子,与他们分别发生了一段故事。本文拟从叙述视角以及有限视角导致的不可靠叙述来解读辛格的短篇小说《旅游巴士》,以便从更深的层面透视辛格的世界观以及战后犹太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命运,从而揭示出该作品的深刻意蕴。

一 第一人称叙述者的有限视角

在叙事作品中,必定有一个或多个叙述者,将故事讲述出来。在叙述的过程中,会经由一个特定的“视角”(point of view),也就是一个观察点,叙述者将所看到的一切呈现出来。叙述视角是“作者和文本的心灵结合点,是作者把体验到的世界转化为语言叙事世界的基本角度,同时也是读者进入这个语言叙事世界,打开作者心灵窗扉的钥匙”^①。视角安排是否精心得当,直接影响到文本创造性审美效应的产生。《旅游巴士》采用第一人称的有限视角,作为故事主角的“我”并没有按照自然时间序列来讲述故事,而是通过叙述者“我”的所见、所听、所想,通过人物之间的对话,通过不连续的信息片段塑造了一个个的圆形人物:言语恶毒、购物狂、有些怪诞神经质的犹太大屠杀幸存者韦厄豪弗夫人、外表绅士内心被妻子几近逼疯的韦厄豪弗先生、生活富裕却事事受控于儿子的犹太遗孀麦塔隆夫人以及年仅14岁但行事颇具成人化、对母亲对自己未来生活统筹安排的少年马克。“我”没有对其他人物在对话中展现出的人和事做出主观评价,而是让读者和“我”一起感同身受,聆听各个人物的倾诉,共同思索事情背后的真相,最大程度地调动了读者的文本参与意识。例如在故事的开头,司机让“我”坐在一位女士(韦厄豪弗夫人)旁边,“我”对她的第一观察是:“她胸前佩戴着一枚醒目的黑色十字架”。黑色十字架是基督教的象征,读者和“我”会一致认为:这位女士一定是位基督教徒。在后来叙述者与这位女士的交谈中发现,她其实是犹太人,是二战集中营里的难民,是她现在的丈夫收留了她,并向她求婚,条件是“她得接受基督教”,阅读至此,读者和“我”对这位女士有了新的认识:她是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但接下来的谈话更具有戏剧性,女士告诉“我”她戴十字架和宗教无关,是一个将死之人送给她的,这个人让她永生难忘,而且是个男人。这时候读者和“我”都会感到困惑不解:这位女士已经有丈夫了,而且他的丈夫是苏黎世的一位银行经理,有着体面的社会地位,当时从难民收容所里认识了她,并收留了她,她应该感激现在的丈夫,为什么她心底还驻着另外一个男人?这个男人是谁?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刻骨铭心的事情让她终生难忘?韦厄豪弗夫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叙述者“我”对事实的真相不做任何解释,只是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甚至自己感到疑惑的事情一股脑儿地告诉读者。这种说一半藏一半的叙事策略不仅引起了读者极大的好奇心,而且能调动起读者的积极性跟随叙述者“我”的有限视角共同参与故事的解读,尽可能地对这些疑惑之处做出自己的合理推测与填补。

辛格选用的这一独特叙述视角也符合申丹归纳的九种视角之一——第一人称体验视角，这种视角将读者直接引入“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内心世界。它具有直接生动、主观片面、较易激发同情心和造成悬念等特点^②。例如在叙述“我”和麦塔隆夫人去夜总会看歌舞表演那次艳遇时，读者很自然地跟随并体会到“我”当时的内心渴望与纠结。“我和这对母子共进晚餐时，马克点了一瓶马拉加白葡萄酒，‘我’喝掉了大半瓶，酒入肠胃后，我整个人就醉醺醺的了。在和麦塔隆母子乘马车去夜总会的路上，麦塔隆夫人一直握着我的手，并不停地喊：‘多么美妙的夜晚啊！漫天繁星！’我碰到了她的胸口，她颤抖了一下，拧了一下我的腿。我们都沉醉了，与其说是因为喝了太多的酒，不如说是因为旅途太劳累。我又一次感到了她身体的热度。当马克故意离开后，我们开始像久别重逢的恋人那样热烈地拥吻”^③。这段文字细致入微地描写了一对久逢甘霖的男女对彼此身体上的渴望，寡居多年、年纪尚轻的麦塔隆夫人渴望一个年长男人的拥抱、亲吻与爱抚；而“我”刚刚与女友分手，独自旅行想忘记那段感情经历带给自己的创伤，酒精、夜色、音乐对“我”催情，令我难以抵抗女人的诱惑，欲望占据了“我”的大脑，“我”渴望肉体上的放纵。但是对欲望渴望的同时，“我”又在警告自己：“马克是绝不容许我们之间的关系只停留在暧昧阶段，他有能力杀死任何一个他认为羞辱了他母亲的人。虽然我对她的身体有强烈的渴望，但是我知道我们之间没有什么精神上的联系和默契，如果真在一起的话，很快就会猜忌、厌倦和后悔。”从夜总会回来后，母子俩人都邀请“我”去他们房间沐浴，“我”明白他们的意思，现在有机会可以和麦塔隆夫人独处了，但是刚才在夜总会和马车里体内燃烧的激情却奇怪地消失了。“我”用钥匙把门反锁好，熄了灯，和衣躺在床垫上，决意抵抗任何诱惑。读者跟随叙述者的感受身临其境地体会到了“我”既想又怕的内心纠结，同时还能推断出作者的犹太情节，对精神默契的追求高于身体发出的动物本能，因此叙述者“我”用理智战胜欲望渴求的结果也是顺理成章的。虽然全知叙述也能展示人物的内心活动，但作者采用第一人称体验视角能让读者直接接触人物的想法，使读者通过人物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来观察体验，因此能够最大程度地还原事实当时的状态，使读者能更自然地直接接触人物细致、复杂的内心活动，积极投入阐释过程，做出自己的判断。

二 由有限视角导致的不可靠叙述

辛格采用的第一人称体验视角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其局限性，读者仅能看到聚焦人物视野之内的事物和人物的外在言行，往往这些言行的真实可信度会存在偏差、甚至会出现彼此矛盾的情况，究其原因在于故事内叙述者的“视角”有限，导致思想、行动乃至言语上的限制，从而出现叙事方面的不可靠性，使读者产生疑惑。不可靠叙述是一种重要的叙事策略，布斯认为叙述者的叙述与隐含作者的规范保持一致，叙述者就是可靠的，反之亦然。这种不一致的情况往往出现在第一人称叙述中。布斯关注两种类型的不可靠叙述：一种涉及故事事实，另一种涉及价值判断。叙述者对事实的详述或概述都可能误，也可能在进行判断时出现偏差^④。《旅游巴士》中人物之间的对话存在着多处涉及故事事实的矛盾之处，使“我”和读者对事情的是非本来面目充满了疑惑。例如，韦厄豪弗夫人在评价自己丈夫时，说“他太吝啬了，我想和他离婚却不给我贍

养费。事实上，他给我的钱都不够我花的”。可是她本人是个购物狂，每到一个地方——里昂、波尔多、科多巴，她都会跑去购物，然后大包小包地满载而归。害得所有的乘客都在等她一个人，巴士被迫延时出发。读到此处，“我”和读者不禁要问：韦厄豪弗先生真的很吝啬吗？如果是的话，韦厄豪弗夫人每次购物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如果不是的话，那是韦厄豪弗夫人在撒谎？再例如，在韦厄豪弗夫妇分别和“我”谈论对方的性事时，言辞差异更是天壤之别。韦厄豪弗先生小声地对“我”讲：“我得诚实地说，她确实有一个优点——她对男人很有吸引力。在性事方面，她相当厉害……她想象力丰富，很多奇思异想……她能说出一些让我热血沸腾的话，她脑子里的故事比《天方夜谭》里苏丹新娘的故事还多。我们白天过得一塌糊涂，但是夜晚却很狂野刺激，她把我折腾到不行”^⑤。当“我”向韦厄豪弗夫人说她丈夫称赞她有想象力时，却得到了相反的回答：“不是那样的。他已经阳痿好几年了，挨着他已经让我没有性欲了。肉体上和精神上他都让我感到恶心。我现在缺的就是想象力。他像个吸血鬼似的吸干了我的血液。他性取向不正常。他是个潜在的同性恋，虽不易察觉但仍露有蛛丝马迹——尽管他极力否认这一点。他只想和男人呆在一起，在我们还睡一张床的时候他整晚整晚地盘问我和其他男人的关系。我只好编些风流韵事让他满意。后来他把我这些想象出来的事借题发挥往我身上泼污水并辱骂我”^⑥。通过他们对彼此的描述，我们对韦厄豪弗先生的性取向、对韦厄豪弗夫人的性能力都产生了疑问，肯定有一方掩盖了事实的真相或者夸大事实，但孰是孰非，读者和“我”都找不到答案。《旅游巴士》中还有一部分内容颇有争议，那就是麦塔隆夫人和少年马克的关系，他们不同于一般的母子关系，两人的身份似乎颠倒了，连麦塔隆夫人自己都说马克对待她好像她是他的女儿似的。“我”惊讶地发现这个年仅14岁的孩子具有成人的思维，他不仅插手自己母亲的私事，替母亲安排未来的夫君，想极力撮合“我们”，而这位母亲只是被动地听从安排，就像是旧时的姑娘服从父母的安排给自己找丈夫一样。而且还对“我”的行动强加干涉。每次都让“我”和他们一起用餐，不经“我”同意就替我点餐、要酒水。每到一个城市，让“我”和他母亲一起购物，还严肃地提醒“我”不要为他母亲花钱。有一次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我”的房间，叫醒“我”去他们房间沐浴，在“我”准备离开他们房间前，还让“我”亲吻她母亲跟她道晚安。还有一次不经过司机的允许就安排“我”和他母亲坐在一起。更有甚者，马克还告诉巴士上所有的人他母亲和“我”订婚了。母亲的软弱和顺从与儿子的强势和支配让“我”感到特别奇怪。直到韦厄豪弗夫妇在巴士上大打出手后，全车的乘客没有一个人愿意挨着韦厄豪弗夫人坐，我只好坐在她旁边，她却对我说出了更让我吃惊的话：“那个男孩马克、那个拼命要你坐在那个土耳其贱人身边的男孩不是她儿子……他是她的情人……她和他上床……在马德里打扫房间的女服务员告诉我的。她早上开错了房间门，发现他们睡在一张床上”^⑦。麦塔隆夫人和马克到底是母子关系还是情人关系？“我”的所见和所闻都是那么的不可思议，同样的困惑和质疑也令读者百思不得其解。辛格在小说中设置了诸如此类的矛盾之处，安排了如此多的不可靠叙述，到作品的结尾之处也没有提供任何明确答案，其用意何在呢？申丹指出不管面对作品中何种不可靠叙述，“读者在阅读时都需要进行‘双重解码’（double-decoding）：其一是解读叙述者的话语，其

二是脱开或超越叙述者的话语来推断事情的本来面目,或推断什么才构成正确的判断。文学意义产生于读者双重解码之间的对照。它不仅服务于主题意义的表达,而且反映出叙述者的思维特征,对揭示叙述者的性格和塑造叙述者的形象有着重要作用^⑧。辛格使用这样的叙事技巧显然有利于调动读者的阅读积极性,使读者从人物之间的表层话语推断出隐含其中的深层含义,从而挖掘出作品的主题意义。

三 叙事策略下主题意义的彰显

辛格采用同故事叙述者,让“我”充当叙述代言人(narrator-agent),从第一人称的有限视角观察周围情境和事件的发生,并且把人物之间相互矛盾的言语和行为一一呈现给读者,而不对这些疑问和困惑做出任何解释。辛格使用第一人称有限视角和不可靠叙述等叙事策略是为彰显作品的主题意义而服务的。也就是说叙事策略是方法,主题彰显是目的。笔者认为,辛格在《旅游巴士》这部作品中想要揭示两方面的主题意义:第一是他对世界的看法;第二是他对犹太人命运的关心。

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在为《20世纪第一人称小说的叙事不可靠性》(Narrative Unreliability in the Twentieth-Century First-Person Novel, 2008)一书撰写的篇首论文“疏远型不可靠性、契约型不可靠性及《洛丽塔》的叙事伦理”中,他按照“不可靠叙述”对“叙述者”和“作者的读者”之间的叙述距离所产生的影响,区分了“疏远型不可靠性”和“契约型不可靠性”。费伦认为叙事学界关于“不可靠叙述”的研究大都聚焦于“疏远型不可靠性”,而忽略了“契约型不可靠性”的研究,因此他的论文着重探讨了后一种类型,并区分了六种亚类型的“契约型不可靠性”,第一种是“字面意义上的不可靠与隐喻意义上的可靠”(literally unreliable but metaphorically reliable)^⑨。笔者认为辛格在《旅游巴士》这部作品中采用的第一人称不可靠叙述则符合费伦划分的第一种亚类型,从人物之间对话的字面意义上看,作品中充满了不确定、有违常规的悖论因素,但是这些不可靠叙述并没有拉大读者和叙述者之间的距离,反而在对这些疑惑猜测、推断的过程中,读者和叙述者以及隐含作者在对这些疑惑矛盾之处背后隐含的深层含义看法趋于一致,即对文中的不确定因素所具有的隐喻意义有着共同的认识。这里所说的隐喻意义上的可靠性正是辛格通过呈现不可靠的未解之谜想要传达给读者的信息——蕴含在字面意义上不可靠性内部的主题意义的可靠性。《旅游巴士》中让读者感到困惑的种种疑问都没有答案,反复出现的不可靠叙事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辛格的世界观——世界是个“谜”,充满了未知的神秘力量,人们一直就生活在无法理解、模糊混乱的状态中。理查德·伯金(Richard Burgin)在讨论辛格现代性时指出,辛格生活在一个文明的模糊时代,因此作为一名作家,辛格想让读者感受到他笔下人物对事物真义的顿悟、疑惑以及矛盾

之处,伯金注意到辛格在审美陈述中使用了一个重要术语——“谜”。因此在辛格看来,宇宙本身就是一个“谜”。伯金还指出,辛格是想让他的读者明白,他小说中的人物实际上是在试图理解那些无法理解的宇宙中的结构、样式以及运行规律^⑩。

辛格除了在作品中表现“世界是个谜”这一主题意义外,还运用象征手法彰显了第二个主题——“逃离”的命运。这部小说使用“bus”这一意象具有典型的现代主义文学特征,它象征着一座“无知识海洋中的小岛”,这座孤岛上的五个主要人物以“我”为中心聚在一起,但不管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每个人都渴望“逃离”:韦厄豪弗夫人要逃离众人的愤怒和指责,要逃离丈夫的暴力和淫威,要逃离令她窒息、恶心的婚姻;“我”要逃离麦塔隆母子的纠缠和掌控,要逃离女人带给我的烦恼和纠结,要逃离和我根本就无关的是是非非;马克要逃离现在学习生活的英国,更不愿意回到母亲生活的土耳其,千方百计想要尽快实现自己的美国梦;麦塔隆夫人想要逃离儿子对她生活的控制,不想让他决定自己的要和谁结婚、要在哪儿定居、要和什么样的人交往等一系列私人问题;韦厄豪弗先生想要逃离这个总是令他感到耻辱的妻子,他痛下决心一定要逃离这场灾难性的婚姻。从犹太历史来看,这个曾屡遭破坏、四处流亡迁徙的民族总是和“逃离”这样的命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小说的结尾很耐人寻味,“我”逃离了是非混沌的巴士,登上了发往比亚里茨的火车,却发现韦厄豪弗夫人也在这列火车上。火车和巴士虽然都是交通工具,但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火车具有固定的行走轨道,具有明确的目的地和出发到达时间,乘客也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目的地。辛格安排这样的结尾也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我”和韦厄豪弗夫人都是犹太人,在这个是非不明、充满神秘的现代社会里,失散了犹太人终将逃离各种困扰走到一起,不管是回到犹太的古老起源地——耶路撒冷还是驶往多元文化并存的美国,犹太民族的命运是密不可分的。

注:

①里蒙·凯南:《叙事虚构作品》,姚锦清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9页。

②申丹:《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7页。

③⑤⑥⑦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巴士》,魏小梅译,《外国文学》2012年第2期,第10-21页。

④⑧申丹:《叙事、文体与潜文本——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9-60页。

⑨张丽:《不可靠叙述研究的新进展——评〈20世纪第一人称小说的叙事不可靠性〉》,《叙事》中国版(第四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46页。

⑩乔国强:《美国犹太文学》,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327页。

(责任编辑:群喜)

(上接37页)

增强核心企业在整个产业链上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1] 邵志燕:《从金融结构缺陷视角谈中小企业融资难问

题》,《商业时代》2012年第10期。

[2] 巴曙松等:《2013小微企业融资发展报告—中国现状及亚洲实践报告》。

(责任编辑:余小平)